

【文化大家】

□黄万华

他让东西方如此接近

程抱一像个辛勤的摆渡人,来往于中西文化之间,其作品一次次让法国报刊惊叹:程抱一让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世界从来没有过地接近!



近400年风雨侵袭中越发庄严肃穆的法兰西学院有一堵“不朽者”之墙,上面镌刻着所有院士的名字:拉辛、高乃依、孟德斯鸠、伏尔泰、雨果、大仲马、泰纳、柏格森、法朗士……每一个名字都让驻足者肃然起敬。2002年,这堵墙上有了第一个亚裔院士的名字:从中国来到法国的程抱一。

程抱一1929年出生于济南。我读他的诗文,总感觉到涌泉的古城在他心灵中的滋润。他从南京金陵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正逢因抗战中断的旅欧留学得以恢复,赴法留学,在巴黎第九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上世纪60年代,程抱一

求学期间就与罗兰·巴特、列维·施特拉斯、拉康、福柯等著名学者交往甚多,当时结构主义兴起,程抱一既敏感,又功力深厚,运用这一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唐诗和其他中国艺术,《中国诗话语言》和《虚与实——中国绘画语言》等著述问世。他不仅在西方现代理论的视域中将中国独有的艺术宝藏一一展示在西方人面前,而且通过中国诗画“把中国思想的精髓提炼出来,对生命的本质进行了思索”,法国艺术界和学术界叹为观止。自此,程抱一像个辛勤的摆渡人,来往于中西文化之间,其作品一次次让法国报刊惊叹:程抱一让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世界

从来没有过地接近!

1999年,程抱一发表了用12年心血写成的长篇小说《天一言》,翌年获法国极有影响的费米娜文学奖。很高兴的是,《天一言》的中译本是在济南首次出版的。记得那年寒假,我和家人一起读到《天一言》,都觉得写得极好极了,多年后,家人还会惦记着,将来退休了,把《天一言》改编成影视。

《天一言》精彩地阐释了程抱一的“第三元”思想:一元的文化是死的,是没有沟通的,比如大一统、专制;二元是动态的,但是对立的,西方文化是二元的;三元是动态的,超越二元,又使得二元臣服,三元是“中”,中生于二,又超于二。两个主体交流可以创造出真与美。这一思想既来自以老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的路线或方式,又吸取了主体间性等西方现代思想资源,或者说,“第三元”是在西方语境中完成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

《天一言》的中文版自序引用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所言“真正的生命是再活过的生命。而那再活过的生命是由记忆语言之再创造而获得的”,而程抱一意识到,“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天地”,任何二元之间的对话关系都会产生“真三”的最高境界,而语言正是实现二元向三元转化

的决定性因素。

2005年,程抱一的诗集《万有之东》被列入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具有经典意义的《诗》丛书出版,在法国销售一空,一版再版。程抱一曾解释,“万有之东”的“东”并不是指东方,而是指超越“万有”之外,超越东、西之外,超越一切之外的“东”,这是一种包容一切的境界。《万有之东》中的万物都充满了生命的灵性,都会唱歌或自语,彼此交流,还与人类对话。而一首首诗就如一幅幅神韵生动的中西山水画,或笔墨淡雅有致,或色彩浓重有序,但都弥漫出和美的气质,而又有着内在哲思的支撑,呈现出从个人心灵深处喷发而出的跨文化对话的魅力。

“二元”无法回避,也不能否定,我们往往生活在“二元”之中,但生命要向“三元”探求、提升、包容、开放。谁拥有“第三元”,谁的生命就将永恒;一个民族懂得、实践“第三元”,将是民族之大幸。所以,程抱一的“第三元”思想一直让我入迷、向往,以至于今年初山大自主招生面试时,要我现场出题,我想到的第一道题就是下面这道: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你能谈谈对老子这段话的理解吗?(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

【历史新解】

□范泓

陈炯明的政治理想

陈炯明并非是一个“空想的理论家”,他的“政治理想”亦非毫无历史价值。事实上,他是一个敢于面对挑战、力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改良者”。

陈炯明(字克存)是近代中国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当年国民党以“党化教育”之需,斥之为“叛徒”、“军阀”,可见其中莫大贬义。事实上,陈炯明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尤其主政广东期间,严禁烟赌,发展教育,提倡新文化运动,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实践,反对武力统一中国,不失为政治上的一种远大目光,亦因此,与孙文政见相左,最终决裂。从那以后,国民党史家对陈炯明大都“诬蔑诋谮”,国民党元老之一莫纪彭痛心疾首,尝言:“大多出诸个人之恩怨好恶,而各种批评之悖于史实者,莫甚于否定竞存献身革命之光荣经历。”

七十多年过去,今人对陈炯明的评价和认识或有改变,尤其对他与孙文的矛盾及生死冲突,能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这自是理性的一种回归。不过,从历史事实看,陈炯明确是一位复杂多面的政治人物:你说他是“军阀”,他一生最注重的是“文事”,即如唐振常所言,“他本人就长于文事,虽掌军而反对军治”;你说他出资捐助中共在广东的机关报(《广东群报》),他后来的政治取向又突然转变;你说他寄希望于在苏俄军事顾问帮助下改造军队,他又极力反对“党治”和“党化教育”;你说他是孙文革命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他却坚决反对武力北伐,甚至认为选举“大总统”非在其时,请孙下野……尽管如此,政治经历复杂的陈炯明,当年主政广东坚守“联省自治”不失为历史的一

种理性选择,“就20世纪上半叶而言,联邦制——‘联省自治’是统一和发展中国最好的道路”(袁伟时语)。

1920年以湖南省为首,西南各省相继展开“省宪运动”,广东社会也出现类似情况,“这一方面是受到舆论报刊之影响,而另一方面,实在也是因为桂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护法军政府在广州存在的三年多期间中,使广东省民有了痛苦的经验”(胡春惠语)。就陈炯明个人而言,除受到风潮影响之外,“且其在闽南之政治经验,也是鼓励其决心自治的原因”;再加上“护法已不足为号召”(陈炯明语),全国人民渴望的不是武力讨伐,而是“和平统一”。此时,北有遭指责的“非法”(第二届国会正式选出)总统徐世昌,南有“非常”(“非常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合法性遭质疑)总统孙文,当时舆情倾向,两极不已,惟清醒者这样认为:“南北政府已完全破产:论法则南北皆非法,论人则南北皆不为国民所信,论武力则南北自身皆无本领以统一中国。欲解决此不死不活之局,舍实行联省自治外,更无其他比较妥善的办法。”

1921年春,广东省议会起草省宪时,作为省长的陈炯明“并驾齐驱地写了一个密约,题为《建设方略》”,此文件1922年5月首次在香港报刊公开,其中强调建立“地方分权”政制的必要,即“徒以中央与地方之权尚未规定,中央恶各省之异,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中央之专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纷乱,乃不可收拾矣”(《陈竞存先生年谱》)。

也就是说,联省自治的实质,并非是要破坏国家统一,而是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只有废督裁兵,选择联省自治的道路,建立一个有实权的中央(联邦)政府,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若如诉诸武力来统一中国,即以新军阀或拥有军权的党派来代替旧军阀,到头来,还是弄成集权专横的局面,这一政治远见,为后来的历史所明证。

孙文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出于现实考虑,开始也赞成联省自治。在宣言中称:“……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唯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未多久,孙文改变了对联省自治的态度:中国原来即是统一的,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

陈、孙二人之争越发激烈,及至1922年发生“6·16”广州围攻“总统府”,炮轰观音山事件。以胡适当年的看法,原本“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之酿成“武装的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不曾上轨道”。但无论如何,当时舆情认为“这件事表露了南方内部的公开破裂,给联省自治运动一个重大的挫折”,和平统一运动终被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所压倒,而此一转折,对中国近代化方向的影响,可谓深远。

陈炯明曾对美国教授杜威说过,“中国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真统一’的问题”。在他看来,“北之军治,南之党治,皆违反共和原则”,进而批评道:“民国主权,在民而不在军,尤不在党,此理甚明,何以南北当局,死而不悟,非缺乏政治常识,即属倒行逆施……”客观地讲,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主要依据来自当时的社会现实,就广东而言,不仅物产丰富,“更有庞大的侨汇为其后盾”,在民国初年“各省皆穷的情况下,被认为是有着自力更生条件和最能实行立宪自治之省份”,正如当年驻北京美国公使雪曼向国务卿所报告(1921年9月16日)的那样,“南方政府在广州设立一个极有效率 and 现代化市政政府,同时积极进行全省地方自治,他们宣布的主义是由‘联省自治’来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广东目前毫无疑问地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省份,可能也是管理最有效率的省份之一”(《陈竞存先生年谱》)。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李剑农也认为:“若要解决国内的争端,还是非用联邦的方法不可,这是国民团体的一般心理。”

从这一点看,陈炯明并非是一个“空想的理论家”,他的“政治理想”亦非毫无历史价值。事实上,他是一个敢于面对挑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复杂的中国南方社会,力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改良者”,尽管后来失败了,但联省自治作为近代中国一次良性建设尝试,在历史上自有深远影响。

(本文作者为历史学者,著有《历史的复盘》等书)

北宋毕升在公元11世纪便发明了泥活字,稍后又有人发明并应用了木活字,金属活字虽始自朝鲜,但引入中国也是很早的事情。然而,直到19世纪末,雕版印刷仍然在印刷界占据压倒性的垄断地位,活字印刷品虽不能说凤毛麟角,但数量和影响远远不如雕版印刷品。反观西方,古登堡在1450年发明第一台活字印刷机后,活字印刷很快风靡全欧洲。

个中原因当然复杂,有技术上的:西方的字母数量有限,形制规范,不似中国方块汉字字多形异,更便于推广活字印刷。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否则何以字体相近的朝鲜,其活字的应用反倒远远多于中国本土?

活字印刷最大的优点是不必一块块雕刻印版,更不必因为一字刻错而毁版返工,

【探究真相】

活字印刷在中国为何迟迟得不到普及

□陶短房

相比雕版印刷,它更适宜快速出版和在一定的时间内用较低的劳力和成本印刷大量不同的书籍。但这一优点对于宋元明清的中国出版界并不重要。

当时出版的书籍主要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和史发行量最大,却都是历史流传下来,很少改动的东西,像四书五经这样的典籍更是一传几千年。出版这些书,费大力气雕刻一套印版,只要确认无错误,就可原封不动地用上几十甚至几百年,而使用活字排版反倒要经常复排,对于文化不高的排字工而言,出错的概率反倒大于雕版,成本也未见经济;而子、集等杂书倒是发行量小,品种多,本来适合用活字的,但写这些的往往不是殷富官宦就是才子学士,对于他们而言,雕版印刷可以讲究刀工字体的风格特点,而活字印刷则只能用呆板的印刷体,明代胡正言发明套色雕版彩印之后,雕版对于这些人的魅力就更大了,而且他们的财力通常也能承担这样的开支。

例外也不是没有。元代的活字印刷一度在官方印所盛极一时,为了应付繁重的排版检字工作,一位叫王祯的人发明了能大大提高检字效率的转轮式排字盘;明代流行的话本小说等,大多是活字版本;而清代,为了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国子监一次性铸铜活字达一亿四千六百万个之多。

这些例外的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元代以少数民族立国且疆域辽阔,特殊的行政官吏体制和多民族官员共治的局面导致了元代官方文书的浩瀚繁杂,印刷这些更新频率极高的文书之类,费时费钱的雕版印刷是无法胜任的,而可以任意快速排版的活字却正合此任。也正因此,清代前期出版的《邸报》,从手抄改为印刷时,也立即选择了活字,因为每期内容不同、出版频率较高的《邸报》是不适合一期期雕版付印的。明代开始印制统一抬头落款的空白文书,文书正文由书手誊写,于是,适合保存和反复印刷同样东西的雕版再一次大行其道。

明清小说话本被时人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品,却极受民间市井的欢迎,属于流行程度很高的印刷品,印刷者往往是牟利性的私人书商。作为以利益为最高目的的商,出于迎合市场和消费者口味的需要,他们必须做到出书新、出书快、价格公道,并能及时随着市场口味的变化而改变品种,这样,灵活方便的活字取代昂贵笨拙的雕版就成为了必然。

有时,一些本来用雕版印刷的书籍会因为特殊原因使用活字,如西夏印《大藏经》,清代印《古今图书集成》,都是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典籍卷册的出版付印工作,使用活字几乎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而一旦条件许可,就会重新走到雕版的老路上去,如西夏续刻的佛经又重新采用了雕版,清代国子监后来出书更多,又重新逐书刻版,把多达一亿多的铜活字送去铸成了铜钱。

西方古登堡的活字正好在文艺复兴兴起、德国宗教改革开始、需要大量印刷品的时期,其首次推出的活字印刷品,恰恰是第一次用德文这样的民族文字而非宗教性的拉丁文出版的《圣经》,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因为西方的活字印刷术是在时代和市场需要的时候适时产生的,所以很快成为印刷界的主流。而在中国,千年不变的经史子集出版为主流的模式,使得易于保存初梓、适于重复印刷相同文字的雕版成了印刷界的主宰。发明活字的毕升本人任职于私人书肆,应用活字最普及的也偏偏是印刷流行读物的私人书肆,这难道不是令人深思的事情吗?

(本文作者为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